
作为想象的底层

——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

ZuoWei XiangXiang De Di Ceng

令狐兆鹏◎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作为想象的底层

——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

ZuoWei XiangXiang De Di Ceng

令狐兆鹏◎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想象的底层：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 / 令狐兆鹏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34-4103-5

I. ①作… II. ①令…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424 号

责任编辑：罗英 贾志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3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1

一、“现代”的推进与乡下人进城 / 1

二、乡下人进城小说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关系辨考 / 4

三、本书研究角度及结构 / 10

第一章 乡下人进城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19

第一节 乡下人进城的农民工形象谱系 / 19

一、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塑造 / 20

二、民工形象的“温情化”塑造 / 24

第二节 乡下人进城小说妓女形象谱系 / 28

一、残酷物语：妓女的情感世界 / 28

二、才子佳人：单调的爱情想象 / 32

三、零度讲述：缺失的人文关怀 / 37

第三节 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保姆形象谱系 / 41

一、鸠占鹊巢式 / 41

二、自强自立式 / 46

三、自甘堕落式 / 49

第二章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情节研究 54

第一节 情节戏剧化 / 55

一、场景设置舞台化 / 56

二、悬念设置戏剧化 / 62

三、情节编织离奇化 / 68

第二节 情节非戏剧化 / 76

一、诗化的语调 / 76

二、反高潮的叙事 / 82

三、民间的口述 / 87

第三章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叙事研究 94

第一节 独白与对话：“我”的叙事修辞 / 95

一、独白：底层声音的伪饰术 / 95

二、对话：作家走进底层的一种努力 / 104

第二节 “隐匿”与“俯视”：“他”的自然化修辞 / 114

一、隐匿：关不住的作者声音 / 114

二、俯视：作家的集体无意识 / 119

第三节 陌生化的产生：另类视角的叙事修辞 / 123

一、动物视角的新颖化 / 123

二、鬼怪视角的反讽化 / 126

三、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迷宫化 / 128

四、儿童视角的单纯化 / 131

第四章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母题研究 136

第一节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主要母题类型 / 137

一、追寻母题 / 137

二、苦难母题 / 144	
三、异化母题 / 157	
四、悲悼母题 / 164	
第二节 乡下人进城小说母题表达方式 / 169	
一、想象的风景 / 170	
二、创伤的隐喻 / 178	
第五章 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乡下人进城小说……………	189
第一节 左翼话语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小说 / 190	
一、民粹主义思想的表达 / 192	
二、弘扬阶级情谊 / 199	
三、反抗社会压迫 / 201	
第二节 启蒙话语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小说 / 204	
一、对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 206	
二、“底层沦陷”的批判 / 207	
第三节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小说 / 219	
一、被消费的性符号 / 219	
二、商品拜物教 / 226	
第四节 “和谐”话语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小说 / 229	
一、精英作家笔下的“和谐图景” / 231	
二、草根作家笔下的“和谐图景” / 237	
结 语 / 246	
参考文献 / 255	
后记 / 261	

绪 论

一、“现代”的推进与乡下人进城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革命、建设主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但是，有一个方向是不变的，中国艰难地从传统的、静止的农业国家向现代的、流动的工业国家转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变动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① 城市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都市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人们生活的便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整齐街道、游走于街上的电车、各种名目繁多的商品，无不令人感到现代化的便利。另一方面，都市快节奏、规律化的生活把人们纳入一个机械化大生产中，人们被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所笼罩，他们不得被囚禁于一种铁笼子式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是碎片化的、浅薄式的人生体验。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

^①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① 人们改变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是以稳定的、静止的、闲散的方式为特征。“一般来说，乡村社会是封闭的，内敛的，并抱有一种持久的耐心。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② 但是，都市化的生活把一切都打乱了，“在乡村，绝对不会出现‘人群中的人’，人面对的是邻人和家族权威。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同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③

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后果就在于都市的扩大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的萎缩，前工业时代乡村包围城市。其主导生活方式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大家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他们的全部。工业时代恰恰相反，城市蚕食乡村。其主导生活是一种流动的、迁徙式的漂泊生活。

人们为了生活或者理想，纷纷主动或被动走向城市，于是乡下人进城就成了现代性的一种症候。

二十世纪中国城乡流动虽然一直存在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后来被连绵十几年的战争所阻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阻断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在给社会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当时资源奇缺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国家采取了农村支持城市的措施。为了保证上述策略的有效性，国家采取了强制措施限制了乡下人进城。1953年、1954年、1955年、1957年，国家先后四次发出指示，限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束缚乡下人进城的一道瓶颈。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①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以立法的形式将人口分为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并在二者之间设置了重重屏障，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6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企业机关招收新职工名额，限制了乡下人向城市的流动。1977年11月，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徙的规定》指出：“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要严格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户籍制度对乡下人进城的束缚作用，一系列新的户籍改革政策的落实，使得乡下人进城成为一种社会潮流。^①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民工潮，人数大约有一亿五千万，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有两种原因导致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其一，农村土地稀少，劳动力过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带来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民不需要在田地里谋生存，成为自由劳动力，这部分人必然要去城里谋生。相对而言，农村的人均收入与进城打工的收入相比，进城打工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若干时间中，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严峻的生存现实。九十年代农民生活日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矛盾。种地成为农民无法承受之负担，很多土地荒芜，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孤身来城市谋生存。中国每年庞大的人口流动成为一道奇异的景观。90年代再次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以出口加工经济为导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亟须大量廉价劳动力，经济产业以“世界工厂”为特色的现代化，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的直接驱动机制。另外，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众多新型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城市化为乡下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了大量的乡下人涌入城市。这种

^① 1981年，《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5年《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等文件逐步放松了对于农村户籍的管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废止“农转非”制度，1997年《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具备条件的农村户口介意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政策上的扶持推动了乡下人进城的发展。

现象受到社会学界、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也成为众多作家城乡书写的对象。

乡下人进城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潘漠华的《乡心》、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栀子花》、萧军的《第三代》、丁玲的《奔》、老舍的《骆驼祥子》，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再到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作家一直致力于表现城乡流动的小说想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了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此后逐年增多，到了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根据徐德明先生的统计，仅2000-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有224篇/部小说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其中：《人民文学》51（篇/部）；《山花》34；《北京文学》31；《上海文学》26；《十月》22；《收获》18；《当代》12；《钟山》11；《芙蓉》11；《花城》6；《天涯》2”^①大量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涌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症候，是一种身份进入另一种身份而引起的生存危机、文化碰撞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的文学体现，是当下作家试图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文化回答，表达了作家的人生焦虑。乃至出现了与“乡下人进城”相关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话题的持续、热烈、广泛的讨论。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客体。

二、乡下人进城小说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关系辨考

乡下人进城小说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需要加以辨析。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内涵、生成过程、适用语境的分析，本书试图找出概念之间的差异，廓清论题的边界，确定选题的视域。

^① 徐德明：《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中国当代文坛近期引起争议的无疑是“底层文学”的大讨论了。关于底层问题的争论是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唯一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论争。“底层”原是社会学概念，最早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原意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处于从属地位的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群体，主要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庶民”研究，将“subaltern”翻译为“属下”、“底层”、“下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根据人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程度，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商业服务业从业者、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构成了底层的主体。这种区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在社会结构中，产业工人阶层占22.6%左右，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或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占44%左右，商业服务员工阶占12%，失业、半失业人群占3.1%左右，这样，底层占到全国人口的78.7%，以全国人口13亿来计算，就是10.23亿。也即中国人口要有78%以上被划为底层。”^①

底层问题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出版了段若鹏、钟声等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吴波的《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培林、李强等人的《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社会学专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文学界的底层书写表现出迟钝性和被动性，甚至是滞后性，与其说是文学界对现实的主动发言，不如说是受巨大现实存在的推

^①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拉拽行。”^①

1996年文学批评家蔡翔在《钟山》第5期发表《底层》一文，“底层”二字正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998年《上海文学》第7期发表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说道：“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②与此同时，他们呼唤知识界应该倾听底层的声音，应该拒绝以高傲式的怜悯态度倾听底层。他们呼吁应当以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对待底层，并相信底层的声音终将成为坚持平等和公正的强大力量。^③

2004年，“底层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很多学者纷纷参加到“底层写作”的论争中，其中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把“底层写作”研究推向高峰。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

①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② 《编者的话》，载《上海文学》，1998年第7期。

③ 《编者的话》，载《上海文学》，1998年第7期。

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论文进一步拓深了底层文学论争的领域。

打工文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肇始于深圳，后逐渐向南方沿海城市蔓延，并向全国各城市渗透。打工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群分部在以广东为中心中国南部城市，主要代表作家为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等一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发表在《特区文学》《打工族》《大鹏湾》、《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南叶》、《打工知音》等刊物上。

学者杨宏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学”概念。但是，学术界对于“打工文学”内涵的界定一直歧义丛生。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从写作者的主体角度定义“打工文学”。而在主体方面又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必须是打工者写作的作品才是“打工文学”。白焯就主张，“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① 雷达也持相似同样观点。^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打工文学”的主题未必囿于打工者之内，李敬泽就说“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們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③ 杨宏海认为，“所谓的‘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④ 第二，从小说题材的角度界定“打工文学”。洪治纲说，“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⑤ 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⑥ 这些论争进一步反映了学者从不同的

① 黄咏梅：《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载《羊城晚报》，2005年7月30日。

②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2日。

③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2日。

④ 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⑤ 黄咏梅：《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载《羊城晚报》，2005年7月30日。

⑥ 李桂茹：《打工文学：草根阶层的文化表达》，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2日。

角度对“打工文学”的思考，深入了“打工文学”的研究。

从对“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打工文学”，都是知识分子对现有社会现象的一种文学化的命名，从而表达知识分子的人生关怀。“底层文学”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左翼话语的问题。它呼吁知识分子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关心弱势群体，倾听被压抑的底层的声音，从而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警惕和质疑。底层文学更多关注阶层、阶级分化问题，但这更多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对象，而不是文学专长。我们谨防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过于伦理化、道义化。底层问题首先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顶层设计的问题，用文学处理这样的问题，未必是文学之福。从另一方面，“底层文学”的提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焦虑。80年代知识分子激情高扬，俨然一代民众的领袖，九十年代则在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中被严重边缘化了。与底层的永远被边缘化不同，他们的被边缘化有一种被抛弃了的疼痛感。故此他们借此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对文学公义的看法，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关怀，借此释放自身的人生焦灼。因此，“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就有着旗帜鲜明的“为弱者立言”式的左翼倾向性。

目前学术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聚焦于“知识分子如何代言”问题。这其实重新回到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论争的老话题。对此，鲁迅的回答很坚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有寄托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同路人。鲁迅仍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如何在不受其他阶级文化的影响下而保持自己写作的纯粹性。

“打工文学”的提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试图解决鲁迅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分子无法表达底层，索性不如让身处“底层”打工者写“底层”。但是，问题在于，“打工文学”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写作者主体转换的问题，它的提出背后又有着复杂的主流意识形态操纵痕迹。^①写作者很容易在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改变写作立场。洪子诚就表达

^① 这一点我将在第五章论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乡下人进城一节里详细论述。

了这样的担忧：“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了，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了。”^①

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乡下人进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视野。2005年徐德明先生在《文学评论》上撰文《“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提出了这一概念：“‘乡下人’……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当下的乡下人进城指80年代以来从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农村劳力中走进城来、试图改变生活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上亿计的中国农村人口。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其所有劳作的价值都在一个堂皇的现代化社会命题下被悄悄地吞没、消解了。”^②

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相比，“乡下人进城”概念无疑稀释了前两者所独具的意识形态内涵，从而把“底层文学”问题转换为“城乡流动”的现象学式的描述。如果说前者关系到社会的公义、公民的维权等方面的政治话题的话，那么“乡下人进城”则成功地把这一问题描绘成为“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阵痛。实际上，我更关心的是乡下人进城的两个维度：其一、城乡冲突的维度，这是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可能被处理成农村乌托邦与城市恶魔化的冲突。其二、底层叙事的维度，“乡下人进城”必然沦为“弱势群体”，在这一点上和“底层文学”又有重合之处。但是，“乡下人进城”又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有着空间流动的内涵，即一个主体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由此而产生焦灼与冲突，而这恰恰为文学的想象

① 段亚兵、张洪华等：《打工文学与构建和谐社会》见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见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提供广阔的天地。“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右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①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概念即相互区别又互相交叉。底层文学涉及的范围最为广泛，它包括描写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学，涵盖社会各个行业。而打工文学则较为狭隘，则指向作者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而乡下人进城则是从另一个维度思考底层问题，更关注城乡流动。它们之间必然有重合、交叉之处，都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故本文论述的范围是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小说，考察内容涵盖部分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

三、本书研究角度及结构

涉及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水涛、轩红芹、王文初合著的《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李新的《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苏奎的《漂泊于都市的不安灵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外来者”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轩红芹的《向城求生——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范耀华的《论新时期以来“由乡入城”的文学叙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等。上述研究大都着重于社会问题研究，对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把小说内容当做社会研究的一种史料来看待，或者把小说当做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一种研究素材来看待，小说本身的美学、叙事、情节等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其中一些成果虽然涉及文本分析，但尚嫌疏浅，为进一步研究留下广阔的空间。

乡下人进城小说所描述的是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解

^①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见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读自有其自身的道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既然是小说，就是一个文学问题。我们应当回归作品，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些小说进行细读，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我们做出文学判断的基础。杜夫海纳说：“作家的真理在作品之中，但作品的真理却不在作家身上。那么在哪里呢？就在作品的意义之中。在这里，现象学还告诉我们：任何现象本身都带有一种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主体总是呈现于‘被给定之物’中以便组织它、评论它；另一方面是因为‘被给定之物’从来不会以经验主义所想象的感觉—材料的方式作为原始的和无意义的给定。因此，作品永远有一种意义。”^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目前关于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于从小说本身出发，进行的审美研究，尚属薄弱。这也构成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洪治纲曾经深刻地反思“底层研究”的不足，他指出：“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底层写作’研究一直注重各自理论的阐述。尽管一些研究者也曾对一些具体的创作文本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论述，或者说是一种主题学评述，其目的还是为了印证各自的理论性思考。像孟繁华、李云雷、贺绍俊、邵燕君、王光明、吴思敬等人的很多评述，都是停留在文本的主题思想层面上，对其中的形式问题只是简略而谈，很难见到颇为精深的文本解析。特别是对于‘底层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问题，不少人都是以‘概念化、模式化、道德化’等进行笼统地评价，并没有对这些文本的内在不足进入深入的艺术分析。只有张清华、徐德明、陈晓明等少数学者进行了一些较为细致的解析，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文本分析不足的现状。”^②

本书拟从小说修辞和意识形态批评角度来研究乡下人进城小说。中国传统的修辞意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③这种修辞观念仅仅指的是修饰辞藻，无

① 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现象的盘点与思考》，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③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